

從《二十一世紀》迎接 二十一世紀

邱偉平

在《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周年慶的時候，我們正好回顧二十年來世界的經過。這二十年，確實是大變化的前夕。今天世界經濟大恐慌，許多迹象在十多年來二十年前已經看到了，譬如安然 (Enron) 和霸菱 (Barings) 重大欺騙案，又譬如說日本經濟的一蹶不振，前者已經揭示了資本主義缺少誠信的重大缺失，後者又似乎預示了許多現代經濟體的困境。二十年來另一個發展則是西方和東方的力量消長，並因此引發了東方世界剝復。兩者之間當然是有呼應的關係，如果沒有雙方力量的消長，東方當然也就沒有剝復之機。中國的崛起當然更是東方最重要的一個轉變。



話從開頭說起，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生是和啟蒙時代西方文明的巨大轉變同步進行的。西歐的啟蒙運動，乃是揚棄了中古天主教文明系統另開新局。同時發生的是新教的革命，建立了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不必再經過教會或者教宗的中介，個人直接向上帝負責。為了確認自己是上帝選定可以得救的人，個人必須不斷檢查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這一種自我檢驗，造成了巨大的張力，也因此而有巨大的動力，推動個人努力完成使命。這才是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至於各種行為上的模式和反映的道德教條，其實只是這種張力的表象而已。因為「神愛世人」，在神前人人平等，所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成為民主制度的基礎。從天主教會解放出來的民族，也因此可以自己組織主權國家，於是列國體制代替了天主教會的天下普世秩序。重商主義演化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則是與主權國家的存在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後來斯密 (Adam Smith) 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還是以「國」為「富」的基礎。

當然我們更不能忽視，西歐開拓海外領土，尤其開發了新大陸，將新大陸的黃金白銀，無償的掠奪為己有。這一大筆財富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籃金子」，有了這個本錢，西方才在海洋航道上開拓了全球性的貿易，再由貿易的利潤發展了工業化，而工業化又是與現代科學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雖然一般的中國人不太理解現代科學與神學的關係，但如果科學家不是認為宇宙的事物有一定可測的道理，他們也無法從宇宙本身的秩序，建立科學研究自然的理性，也就是必須有神的律作為前提，才能有自然的律作為科學研究的先設條件。從上面這一串話，我們大概可以看出，西歐近代的文明是和基督教的新教教義有密切的關連。

從啟蒙運動的時代到今天也有兩三百年了，經過長期的積澱，上述一套扣扣相連的理性網羅，也不免有相當的變化。主權國家的體制實際上已經在個人和普世的上帝之間又有了一道遮攔，國與國鬥，民與民鬥，個人與上帝之間已經沒有直接的連線了。民主政治，在美國建國時，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巨大的實驗。經過兩百多年的演化，這一套民主制度的不足也逐漸顯露了。到今天，我們只能說民主制度可能是弊害較少的政體，但絕不是完美的政體。民主制度的弊害較少，也許與民主制度的效率較差是一體的兩面。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礎，應當是輿論的自由，讓人民有充分交換意見的機會，但是今天正因為輿論已經企業化，操縱輿論的手已經在一些財團那裏，而不是在人民之中的意見領袖。

在科學方面，近代的科學上探天文，內透細胞核，宇宙之間仍有許多不可解之處，但是其神秘性卻不能用舊日的神學解釋。再加上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各處人類接觸十分頻繁。世界文化的全球性趨向，和其多元性是分不開的。於是，新教神學不再是唯一的信仰，在眾神並立之時，究竟哪一個神是我們可以依靠的對象？信仰的多元性，和前面主張的人類自由，使許多人有無所適從之感。

在經濟方面，資本主義和工業生產配套下，經濟的規模愈來愈大，愈來愈複雜，財富不斷增加，個人生活需求的欲望也跟着產品的日新月異和數量眾多而不斷提升和擴大。這種浮士德的精神，也不斷地要求愈多愈快，愈大愈好。以消費取向的經濟，有了巨大的動力，市場愈來愈大。企業規模龐大和公司股票的上市，一方面使人人皆可能持有股份，另一方面無數的小股東根本無法管束企業的主持者。這種龐大無人能管束的經濟體制，變成欲望的巨魔，可以無限地增加消費，不斷地擴展市場。市場信用的擴張，更是一個大黑洞，經濟體的擴張不能再用貨幣的發行量衡量，只要人有貪欲，信用的黑洞就有自己不斷擴大的動能。基督教的伊甸園，乃是神為世人設立的樂園，人可以使用其中任何的資源維持生活。這一個承諾，本身就使人不做自我的約束。人類消耗的資源也和人類欲望不斷擴大同步進行。於是，人類社會的環境不斷地被破壞，人類消耗的資源也已經到了衰竭的臨界點。上帝既然已經無力，企業的跨國化和

交易的迅速流動，又使國家的法律管不住企業的行為——這是最近兩年來經濟大恐慌的根本病源。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相對於這次而言，只有「小巫見大巫」，沒有這次這樣全球性的規模和嚴重性。

1960年以來，世界各處都出現解構主義或者後現代主義，有人以為這是虛無哲學，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革命哲學。在筆者看來，解構主義正是提出了警訊，預示出現了兩三百年的現代文明，也就是以西歐啟蒙時代的文明為主流的世界文化，已經無所約束，快脫韁而去；驚恐之下，或者失望之下，才有這種走向虛無的反應。有的人人心思變，有的人被巨大的黑洞捲走而不自知。今天美國一般人士，沒有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不少人追逐財富，此外別無他想。大多數人，渾渾噩噩，謀生之外，沒有生活目標。美國的公私機構，工作效率，大不如前。青少年學業成績，大為低落。毒品流行，去年從墨西哥走私進口的毒品，價值數十億美金。這一個社會，不再振作，頗像清代的中國。歐洲諸國的情形，各有不同，而以前富強的英法，也與美國在伯仲之間。整體說來，西方社會已呈現叔世的徵象。

直到最近兩年來，還有不少經濟學家以為問題的癥結是在經濟衰退，應可用更多的消費，刺激市場，以矯正他們以為是周期性的經濟調適。一直到最近，才有許多人意識到，這一次經濟的恐慌可能是目前經濟體制大崩潰的前奏，更可能是現代文明必須轉型的信息。

中國最近的崛起，其實是以中國的廉價勞工和不加管制的資源(包括土地和環境)，將世界消費品的生產轉移到中國，中國人賺了一點工資的差額，卻無可逆轉地失去了生活環境和資源。無可諱言，中國因此累積的財富，由於人口和土地的基數大，也使中國的經濟體儼然處於世界第二或第三的位置。假如中國的發展只不過是依附在前面所說的即將崩潰的全球經濟體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能長保經濟榮景嗎？

中國的問題也該從頭說起。中國的文明體系從春秋戰國以後，逐步成形。儒家和道家提供的理念，都是從人的立場出發，「天」或「神」，其實都是「道」，並不像猶太基督教系統的「神」，主宰了宇宙的一切。「天」和「人」之間是互相影響的，人和人之間也是互相影響的。到了漢代，儒家吸收了先秦的各家思想，完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西漢今文學派代表了長期發展的儒學系統，宇宙、人間社會(包括國家)和人的身體，是三個互相疊合的系統，系統內部經常在變化之中求取動態的穩定，而三個系統之間，又彼此影響。所謂「天人相感」，就是指明環境可以讓人生活，人的行為也對環境造成影響。同樣地，社會規範個人，個人一舉一動也影響了社會的整體。因此，主張人間秩序的皇權統治者，也必須向天和入負責。人對於天然的環境應當順勢而為，卻不是「勘天而用之」，乃是和西方「人力勝天」的態度不同。國家或者皇權也不應絕對掌握個人和社會，過度使用權力，也會招致社會的失衡。掌握知識的人，就應當提出警告，約束權力的濫用。於是，不論哪一種「個人」，都必須自我約束，在一定的人際關係網絡上，適當的有取有予。漢代形成的中國文化價值觀念，在東漢以

後逐漸凌夷，又緊接着和外來的佛教配合，也與本土的道家思想相融，構成了積極與消極，進取和謙退，都按照特定的情況而有所平衡。這一套思想體系，基本上貫穿於中國的古代和中古文明，個人自己有責任自知何去何從。自我負責的精神，也可以形成巨大的張力，發揮為巨大的動力。

但在南宋以後，個人行為倫理化，每一個個人都納入固定的三綱五常，人缺少了自我的約束，而是由教條將個人納入一個又一個框框之內。人的自由權沒有了，人的自主性也沒有了，蒙古滿洲兩次征服王朝統治，使大多數人淪為「奴才」，其生存和行為都必須聽命於主人的暴力。中間夾了一個明朝，又是一個極度專權的皇權，其強暴性不亞於外來的征服者。王陽明的哲學再度提出個人的良知和良能，提出個人是一切的主體，但是，王陽明哲學終究在滿清皇權的強暴之下，再得不到發展的機會。滿清一代，雖然有康雍乾的「盛世」，卻是只見繁華，不見精神。中國文化體系的價值觀念已經所餘無幾。十九世紀，西力東漸，中國已無抵抗的餘力，問題不僅出在物質文明不如人，而且在於不能以僵固的倫理對抗西方個人主義形成的動力。

一百多年來，中國只是要模仿西方以對抗西方，其成效有限。一百年的前半段，中國全盤照抄西方，結果是西化的城市文化和改變得很慢的農村文化，分裂為二。抗戰八年，略為有些建設的城市文化，受戰爭的摧殘，完全毀壞。傳統的農村，以大量人口構成的龐大力量，打敗了城市，也將時間往回拉了幾十年。1950年以後，中國一分為二，台灣部分的中國繼續走城市文化的路線，幾乎變成了美國和日本的翻版，中國文化的成份愈來愈稀薄。大陸部分的中國，要到改革開放以後，才從農村回到城市。而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又一度用城市作為發展的重點，丟棄了農村，也丟棄了城市裏面的窮人。中國內部的分裂不再是橫向的分割，而是上下階級的分割。這種形勢的發展也可以呈現局部性的繁榮。奧運和世博的熱鬧，光彩奪目，其中只見熱鬧，我們找不到精神。有人說，今天中國人共同的價值觀，就是錢！如果這樣子的中國崛起，就是中國的未來，也就是世界文化大變化的另一個選項，那麼我們看見的不過是用已經垂死的虎皮，披蓋在身上，還自以為是另一隻新的老虎！

西方與東方之間力量的消長，確實開啟了一個機會，使中國在經濟上成為世界的工廠，但是，這一個情況是不是再度獲得文化動力的機會？許多歷史學家分析這一類的問題，常常以為一個文化體系是自足的，一個項目會牽動別的項目。實際上，我們對於系統分析的觀點，必須要體會到系統本身是不是密封的，是不是自足的？密封自足的系統，誠如佛家所說的「生住異滅」，是一定的發展過程。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和雅斯培 (Karl Jaspers) 等人的分析，也大致都是假設文化體系是密封而自足的體系，才有興衰起伏的過程，才有大崩潰大突破的觀念。假如我們審察真實的歷史，沒有一個文化體系是完全密封的，許多變化其實常與外來的刺激有關，甚至與天然環境的變化也有關係。舉個例說，佛教在印度發展到極點，然後衰微了。而往北傳到中亞的佛教，卻吸收了救贖的觀點，發展為大乘佛教，傳到中國、朝鮮和日本，蔚然成為佛教的

主流。另一個比較不同的例子是，在近東長期存留的波斯文化和猶太基督教原型的獨一尊神信仰，在中古時代，卻結合為伊斯蘭信仰的文化系統，和兩者都不一樣，又和兩者有密切的歷史淵源。

如果用雅斯培的歷史發展模式來討論，中國文化體系，以長時段論，樞軸時代的儒家文化，在東漢就開始固定了。到宋朝，理學出現，固定的系統僵化了。宋代以後，應當是走向衰微以至於崩潰的方向，最後難免崩潰，然後才會有所突破。這一種解釋方式，從思想形態的層面看，未嘗不是言之成理。可是很難解釋，南宋以後，中國出現城市化與商業化的現象，也引發了民間文化的高度發展。這些社會和經濟層面的發展，可能是和海上貿易兩度提升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後果是，中國的東南和南方在文化和經濟的比重上，都代替了傳統的中原和北方。至於這一系統的衰敗，則是在康雍乾三代號為「盛世」之後，卻無力應付西力的東漸。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無可否認，已經是全球化了，西方文化體系，卻面臨着因為價值觀念的淪喪，導致經濟秩序的崩解。中國也在這全球化的浪潮中，如前所說，居然變成了世界的工廠。但是，中國的崛起，在科技方面，並沒有自己發展創新。在經濟制度上，也沒有自主地發展出健全的生產和分配模式。在這兩個方面，中國並沒有可以代替西方、成為世界主流的潛力。

中國是不是會真正走到文化復興？全看中國能不能在世界文化主流的西方體系中，添加一些新的因素，來糾正西方文化的缺失。上面已經提過，啟蒙時代以後的現代文明，在價值觀念上，沒有了宗教的約束力量，個人主義會轉變為無限的貪欲，人人都想獲得利益，卻沒有人想到責任：對於人群的責任，對於環境的責任和對後世的責任。真神死亡，人可為所欲為；浮士德終於投入了魔鬼的懷抱。

這些看來是經濟層面的問題，也牽動了其他方面的變化。今天的社會，在現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現象中，無論社區，還是社群，都已漸漸離散，許多人已無所歸屬。民主政治，缺少了社區和社群，已無處附麗。輿論媒體的企業化，給予財富掌握輿論的權力。政客參選，必須有龐大財力支持，於是政治也是為財富服務。甚至，科研與學術，因為知識商品化，尋求知識也淪為財富的附庸。人人要求生活更好，更舒服；工業發展，都在追逐效率和利潤；兩者相激相蕩，今天工業生產力的強大，史無前例。而資源和能源的消耗，迅速非凡，造成對生態的巨大影響。不久的未來，地球上將沒有可用的資源，地球本身也可能百孔千瘡，不再是人類可以棲息的家園。列國體制下，國與國爭奪資源，自古已然，於今為甚；核彈的陰影，並沒有制止戰爭。將來，資源短缺時，戰爭幅度和毀滅性，會更為可怕……凡此種種，都指向一個現象：我們在啟蒙時代開展的現代文明，已到窮途末路；如果沒有足以引導改變的重大突破，這一文明體系，難逃崩潰漸滅！而這一危機的根本，就在於人類喪失了生活的目標，找不着生命的意義。

儒家和道教融合而成的中國文化思想方式，本來就不是靠神來做保證，而是靠良心和自覺約束自己，也靠倫理觀念，為「自己」定位。即使吸收了佛教的

強大影響，中國佛教的神聖性，「佛在心中坐」，還是歸結在自己的良心。這是儒家從開始就主張的人文主義，以仁為本的「仁」、人我相處的「義」，以「忠」和「恕」連接為一。宇宙大系統、人間世界的系統和人身的小系統，三重疊合，互相影響，則使中國文化常有「天人合一」的理想。這些觀念，自從西力東漸以後，在中國人的理念中，只剩下淡薄的記憶。啟蒙時代以後的現代文明，本來就應有自由、平等、博愛三個成份，可是今天，「自由」已是無所約束的個人主義。「平等」和「博愛」，兩個人際關係的重要觀念，卻在放任之下，不再約束我們的行為了。

如果僅僅鼓吹要讓上述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的要素，納入全球文化之中做基本價值觀念，非常可能，只是引發了中國的文化沙文主義，加強了偏狹狂熱的民族主義，則於事無補，反而有害。

筆者以為，誠如雅斯培的預測，現代文明的崩潰，接下去的是科技文明的大突破。至今為止，科技文明是強調「理性」，但僅是「工具性的理性」，而沒有碰到「本體性的理性」和「目的性的理性」。理性來自人類的智力 (intelligence)，人類有智力，既是人類有別於其他生物的指標，也是人與人可以彼此理解的本能。科學本來就是人類以理性了解宇宙的途徑，科學技術也不過是人類以理性轉化自然資源為人所利用：兩者都是在「天」和「人」之間，運用人的理性，建構了一個文化秩序。以這一套科技文明的理念，配合前述中國文化一向以人文主義作為基礎的長期傳統，再融合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的自然信仰，以及美洲和非洲原來居民對自然世界的密切關係，我們也許可以在今天文化大崩潰之後，找到突破的新方向，貞下啟元，從窮盡走向另一階段的開始——有一個真正的世界文明，不屬於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主導，而是屬於全人類的共同文化。

中國人口佔了世界人口幾乎四分之一，在締造新的世界文化過程中，就算以人數分攤，也該盡力擔起不少的工作。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已經喪失了自信心，一切都是外面的好；最近，又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驚人成績，不免沾沾自喜，甚至於以為二十一世紀應當是中國的世紀，中國應當是世界的霸主。這些想法，自卑或自大，都不是健康的。誠如《易經》的乾卦，從「潛龍勿用」，經過「見龍在田」，小心翼翼的努力，龍可以「或躍於淵」，一步步走到「飛龍在天」，到了最後切忌強出頭，以致「亢龍有悔」：將來的世界最好是大家一樣大，一個「群龍無首」的好現象。《易經》是一本人生哲學的書，體現了人間的悲歡起伏，成功敗壞，告訴我們許多應該做和不該做的事。個人的生命，是不斷的變化，人群的命運和人類全體的命運，何嘗不是像個人一樣，要在變化之中，獲取經驗，用人類的理性，將知識提升為智慧，為自己，也為全體人類，從小處開始，點點滴滴地共同建構一個可大可久的世界新文化。

許倬雲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校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